

试析中国特色软权力的理论基础

——“一带一路”与国际规范供给的视角

[丹麦]李 形, 张久安

[关键词] 软权力; 主导权; “一带一路”; 国际规范

[摘要] 本文以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以及中国国际规范的供给为研究背景,旨在为理解“中国特色软权力”提供理论基础。笔者首先应用葛兰西学派的政治学理论及新葛兰西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对以约瑟夫·奈为代表的主流“软权力”概念进行批判性反思,将“软权力”定义为既在内部构成主导权,又在外部塑造世界秩序的重要力量。由笔者所首倡的“相互依存式主导权”理论将介入对国际政治经济大变革时代硬权力与软权力交互关系的讨论。本文认为,如果中国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经济上的高速增长,那么其经济实力的“外溢”效应——特别是在海外援助、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等全球议题领域的积极作为——将最终使中国对外政策和国际行为成为“常态”。由此而来,传统的软权力的概念必将会容纳“中国特色”。

[作者简介] 李形,丹麦奥尔堡大学发展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与国际关系学刊》主编(丹麦 奥尔堡 9220),浙江嘉兴学院特聘教授兼国际问题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张久安,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后(北京 100875)。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学派纷纷从各自的理论假设出发,以“权力”(power)为核心变量彰显出各自在解释国际发展等经验事实中的理论张力。不同学派对“权力”的不同理解也带来了截然不同的世界秩序

观^①。而其他与“权力”相关的国际关系概念,诸如影响力、武力、强制力、威慑力、诱导以及胁迫等却在不同的语境与情境中被国际关系研究者们所广为使用。自约瑟夫·奈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

^① 英文 power 可以翻译成“实力”,“力量”和“权力”等。在本文的语境下作者选择“权力”。这也是一个具有争议的概念。国际关系学界尚不能对它的定义达成一致的认识。摩根索指出,“在政治科学中,政治权力是极其富有挑战与争议的概念”参见: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Third Edi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3, p.27. 沃尔茨认为尽管权力是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但其恰当的定义依旧存在争议,参见:Kenneth N. Waltz, “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sponse to My Critics”,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333. 而在吉尔平看来,权力是国际关系领域最为复杂的概念之一而且更坦诚五花八门的“权力”定义足以让政治学者们疲于应对。参见:Robert Gilpin, *U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25, p.24;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3.

出“软权力”^①(soft power)这一概念以来,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将其关注的焦点聚焦在想法、观念与价值的“权力”维度之上。近年来,在关于中国崛起与全球权力结构变迁的讨论中,“软权力”日益突显出其重要的学理价值。

从欧洲中心论和其一体化进程的视角出发,“软权力”的概念意味着对“规范力量”(normative power)的迷恋。规范力量作为基于道义正当性的、积极向善的“正能量”,是国际关系行为体在既定身份下对恰当行为的自我探求。^{[1](P887-917)}随着当今世界政治日趋“规范化”,各种国际行为主体竭尽全力地通过国际规范的供给,参与到国际规范塑造的进程中去,提升自身的“软权力”;并最大化地通过投射软权力谋求自身利益。随着“一带一路”的落地实施,以及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成立并吸引了越来越多西方发达国家的参与^②,关于中国究竟是现行世界秩序的“革命者”还是“改良者”的争论再次困扰了国际关系学界。学者们争论的焦点在于,崛起的中国软权力投射及其对既有世界秩序的规范供给,究竟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力量?对上述问题的讨论,都离不开对新兴国家在既有世界秩序中的权力,特别是“软权力”的科学分析。

一、权力的概念及其争论

1.“硬权力”、“软权力”与“巧权力”——约瑟夫·奈的理论解读。

“软权力”(soft power)一词最早见诸于1990年约瑟夫·奈发表于《外交政策》的论文以及同年出版的专著《注定领导: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奈主张“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合作或软权力而不仅

仅是强制性命令的方式使得其他国家为自己所用”。这是奈关于“软权力”的最初论点。作为与“硬权力”相对应的概念,“软权力”被视作让他人实现自身所期望结果,或说服他人朝既定方向行动的能力。^{[2](P5)}面对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崛起,约瑟夫·奈的“软权力”学说显示出了双重内涵:一方面,“软权力”被巧妙地作为全面考察国家整体实力的重要指标;另一方面,奈的“软权力”定义在某种程度上低估了中国大国成长所取得的成就。依据奈的“软权力”学说,尽管中国在经济、技术和军事等硬实力上处于一流国家的行列,然而在“普世”意义上依旧是第三世界国家。在奈看来,软、硬权力在当下的国际政治博弈中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

“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是弗朗西斯·培根的名言。但是,知识背后的“权力”的支撑(power is knowledge)则鲜为人们所提及。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将西方世界奉为知识与理念的生产者;视为为自然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知识的积极推动者。但在这背后,为“定义”以及“辩护”西方知识而服务的有形或无形的权力资源却常常被人们所忽略。事实上,是权力决定着某系统的知识究竟是普世的、科学的、富有创造性的;还是粗糙的、局限的、甚至非理性的。奈的“软权力”理论是建立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对自身“实力”重新反思的基础之上。“软权力”的出炉在政策取向与现实影响中有着深刻的新自由主义痕迹。在这一语境中,它不仅仅是新自由主义(普适的价值与规范)阵营中的核心要素,还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过去的四十多年中,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成功摆脱了

① 自约瑟夫·奈的“soft power”概念出炉以来,国内的学界对于这个概念的中文翻译是“软实力”。但是笔者认为,实力是有形和无形力量的概念,如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文化实力等。但是实力的概念并非能最佳体现约瑟夫·奈的“soft power”概念的引申意义,即能体现主导力量(hegemonic power)、规范力量(normative power)和塑造力量(shaping power)所折射出的对外的影响力,而中文的“权力”的概念可能更好地包含这个语境。本文就是基于这个概念的基础上通过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来探析中国崛起的硬权力背后的软权力的形成、发展和规范化的趋势。

② 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在G20杭州峰会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仍有包括加拿大在内的20多个国家等待加入亚投行。

美式的“普世价值”的理论而取得了相当的成功^①。

2.“一带一路”与奈的“软权力”——待思考的问题。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与落地,“一带一路”的软权力维度,得到了学者们的积极关注^②。在笔者看来,一方面,地区经济合作倡议的提出与“软权力”密不可分。“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外交构想,更是崛起中国的软权力战略。另一方面,正是中国的软权力构成了“一带一路”战略,中国特色的“软权力”作为规范的供给(尽管目前仅仅局限在政治关系的理念方面,如互联互通、互利共赢、正确义利观等),其塑造、提升与红利的释放关乎“一带一路”的成败。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忽视了对中国式“软权力”思维方式,以及“软权力”在中国对外政策中独特角色的研究。究其根源,一方面,人们习惯于用西方的规范标准来分析和评价中国的外交政策实践。另一方面,中国的官方和学界也确实接受了“软权力”的西方定义并将它应用到自己的讨论中。但是,厘清中国“一带一路”软权力背后的理论基础问题,关系到崛起中国作为既有世界秩序的“改良者”,以何种方式参与国际规范的补充性或修正性供给中去。

结合上述问题,以及前述对于约瑟夫·奈“软权力”概念的辨析,本文研究的焦点不是就“软权力”的概念本体展开争论,而是以“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为契机^③;在国际规范供给的背景下进一步探究中国软、硬权力之间的交互关系,探究中国特色“软权力”的理论基础。具体说来,如何能够

超越西方的视角,在“一带一路”与国际规范供给的研究中,考察中国特色的“软权力”?

3.研究的基本概念、理论框架与学理反思。

从概念界定上看,笔者反对约瑟夫·奈的软权力有其独立性的主张,而将“软权力”与“硬权力”看作一枚硬币的两面,相互补充,不可分割。硬权力是软权力的基础,同时硬权力也决定着软权力的塑造方式。软权力是建立在硬权力的物质基础之上的;硬权力为软权力作用的发挥提供了物质基础。在研究中,笔者特别强调葛兰西的“主导权理论”中强制(硬权力)与认同(软权力)在实践中的统一性。在中国崛起及实力变迁的讨论中,笔者认为当前对于中国崛起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硬权力方面,即中国崛起的军事和经济意涵;而忽视了由经济成功所带来的“软权力”议题。“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更凸显了“相互依存式主导权”视域中中国特色软权力的重要学理价值。

本文特别注意到,关于“软权力”的学理讨论可以将约瑟夫·奈的“软权力”思想为切入点;但在深入的追问中,一定要以葛兰西、考克斯(Robert Cox)以及沃勒斯坦的理论主张为旨归。换言之,只有厘清了从葛兰西主义政治理论到新葛兰西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再到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演进过程中所暗含的“软权力”思想脉络,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当前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规范供给背后的“软权力”博弈,以及中国特色软权力的“一带一路”投射。

现阶段,关于中国崛起及其对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影响的国际关系研究可谓是汗牛充栋,笔者

^① 复旦大学唐世平在FT中文网撰文,称“中国是一个不算太成功的‘发展型’国家”,并主张避免“中国特色”、“中国模式”以及“中国道路”等可怕的骄傲。但笔者认为,从认识论与知识论的角度看,中国发展的经验与道路确实超越了西方既有知识的范畴,形成了一定的“中国特色”。参见:唐世平:《中国还不是特别成功的发展型国家》,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9171?page=2(最后访问:2016-09-06)。

^② 参见:《“一带一路”释放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国文化报,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15-03/16/c_127584516.htm(最后访问:2016-09-04);李希光:《增强文化软实力 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光明日报》,http://news.ifeng.com/a/20151130/46443686_0.shtml(最后访问:2016-09-04)等。

^③ 在笔者看来,2016年4月23日,经国务院授权,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公开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标志着“一带一路”正式推进实施。

也曾就如何理解上述问题发表过多篇研究成果^①。值得注意的是,笔者所原创的“相互依存式主导权”理论,作为(新)葛兰西国际关系理论的修正,指出了“主导权”(hegemony)^②在国际政治经济大转型时代的复杂与交织。相互依存式主导权意味着动态的博弈局面,既体系中的现行守成国与新兴的崛起国交织在世界秩序塑造与被塑造交互作用之中。^[3]崛起的中国与既有国际秩序也存在这样交互作用的连接,交互作用的辩证性体现在软权力与硬权力在挑战、制约与配合中相互作用。除此之外,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也将被引入到研究中来,资本主义世界的历史经历了主导权力的兴衰,在这一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强国都会有自己的“治理方式”,^[4]即倾向于将其自己国内的治理文化与制度安排拓展和根植到世界秩序之中。

二、世界秩序中“主导权”的理论解读：“软权力”与“硬权力”的交互连接

“主导权”的概念常常被用来描述秩序在国际体系中的现实维度,这一概念对于理解与把握世界秩序与国际关系(体系)动态与辩证的交互连接有着积极的意义。现实主义认为“主导权”意味着霸权国家在国家间关系中的绝对统治作用,正如现实主义经典的霸权稳定论所揭示的那样。而自由主义将主导权看作嵌入在行为体之间互动底端

的“规则制定者”,而诸如规范、价值等国际制度则被视为形而上的“规则”。世界体系理论则特别强调由全球劳动分工所产生并维系的以国家为载体的“阶级”及“主导权”的物质形态。全球分工所带来的持续的不平等交换,这种不平等交换反过来从经济、政治以及军事上作用于“强大—弱小”、“富有一贫穷”的格局。

在国际关系的视域中,主导权被界定为实现权力关系由国家层面向国际层面延展的能力。即主导国的生产方式、社会经济与政治结构由其国内转移到国际层面,通过主导国与国际之间的“国家—市场—社会”的互动,建构按主导国意愿的全球治理模式,塑造世界秩序。毋庸置疑的是,在整个过程中,真正起到塑造作用的依旧是硬权力,而不是软权力。从引申的意义来讲,葛兰西主导权的政治理论对统治与认同(也可以解读成硬权力与软权力的关系)给予了精辟的分析。尽管约瑟夫·奈在著作中没有将他的理论同葛兰西以及新葛兰西学派相联系,但是我们还是或多或少地看到了葛兰西“主导权”思想的影子。

在葛兰西看来,国内政治中的“主导权”意味着统治阶级通过“强制和认同”相结合的方式对被统治阶级实施统治,即统治阶级维持自己的统治,而得到被统治阶级的认同。“基于认同的统治”代表着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而不仅仅是政治、经济、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某一维度。尽管葛兰西

^① 参见:Xing Li (ed.),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Capitalist World Order*, Surrey, UK: Ashgate Publisher, 2010; Xing Li and Oscar Agustín, “Xiānghù yícún shì bàquán: ‘dì èr shìjiè’ hé jīn zhuān guójiā de juéqǐ tōu xī” (Translation: Interdependent Hegemony: an Analysis to the Rise of the “Second World” and the BRIC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No. 1, 2014; Xing Li and Steen Fryba Christensen (eds.),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Impact on Semi-periphery and Periphery Countries*, Aalborg-Denmark: Aalborg University Press, 2012; Xing Li and Osman Farah (eds.), *China-Africa Relations in an Era of Great Transformation*, UK: Ashgate Publisher, 2013; Xing Li (ed.), *The Rise of the BRICS and Beyo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Emergence of a New World Order?*, Farnham, UK: Ashgate Publisher, 2014.

^② 英文“hegemony”一词在中文词典的普遍翻译是“霸权”。笔者在目前的中文的文献中看到的大多是“霸权”。而国际关系中“hegemony”的英文原意出自葛兰西的论述和考克斯的葛兰西国际关系学理论。这里 hegemony 指的是一个国家统治阶级或一种社会体制能保持领导地位和在国家各领域保持主导权的能力。这种能力又能把这个国家的性质特征延伸到国际层面并塑造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的走向。因为这种能力包含了一定超越阶级和意识形态的普遍性价值观,也包含了统治阶级弹性和伸缩力以及不断妥协、更新和自身不断完善的素质。因此,如果超越意识形态“hegemony”应翻译为“主导”,“主导性”,“主导权”。

并没有使用“软权力”这个时髦的语汇。但是,我们不妨做出如下的概念类推,即葛兰西笔下的“政治社会”(国家)是代表统帅强制性力量的硬权力,而公民社会作为软权力,其社会认同与接受力量的体现,这就构成了国家政治硬权力与公民社会软权力之间相互依存的交互连接。正是上述由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认同所构成的政治控制模式,在西方被视为发达资本主义的“主导权”。

在新葛兰西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硬权力和软权力被视为支撑主导权内在运作的重要力量。在主导权研究的视域中,将硬权力与软权力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解释软、硬权力的扩张对世界秩序的塑造,这为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的讨论提供了有益的视角。新葛兰西主义很敏锐地把握了主导权、世界秩序与历史变迁的交互连接^①。深刻地揭示了国家内的主导阶级和社会力量掌控的主导权,是如何逐步外显并投射到世界范围内,进而塑造国际秩序的。这种理论阐释有效地解释了二战结束后美国获得世界秩序主导者地位及其对主导权的护持。与此同时,在笔者看来,上述理论对于解释中国崛起以及“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软、硬权力之间的交互关系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

奈的“软权力”概念可以批判地同葛兰西的“主导权”理论建立起或隐或显的联系,诸如“服从—强制”、认同合作与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之间可能存在理论性的联系。在葛兰西看来,意识形态(思想、规范与价值)并不是人们政治与社会实践中虚无缥缈的东西。^{[5](P58)}恰恰相反,意识形态实实在在地根植于人们的生活和社会实践中。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约瑟夫·奈的主张似乎暗示着软权力并不必然依赖硬权力的观点,并得出软权力与硬权力是可以分开讨论的结论。这就同葛兰西“主导权”理论所主张的强制(硬权力)与共识(软权力)在实践中不可割裂的观点存在分歧。由于软权力的最终意义在于维持霸权式的主导,因此,软权力本身并不是终极目的,而是实现

终极目标的有效途径。在葛兰西看来,尽管共识性的权力十分重要,但不能仅仅为了达成共识而牺牲对主导权力的获取。换句话说,共识性的妥协(或称“消极革命”,葛兰西语)是必要的,但不能据此挑战统治阶级所主导的经济秩序(即物质基础)。失去了统治阶级所主导的经济秩序就相当于失去了既有生产模式再复制的能力。而这种再复制的能力,正是统治阶级用来创造旨在维系统治的物质基础,进而维系霸权式主导权并用来“满足”被统治阶级共识的根本途径所在。葛兰西的理论认为主导权是软权力与硬权力的交互融合,这为我们讨论软权力与硬权力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三、主导权中的软权力——新葛兰西主义的视角

当前的世界秩序通常被称为“战后世界秩序”。由于美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后仅存的全球超级大国,既有的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建立并维系的。如图1所示,四个支柱支撑起了美国主导的战后世界秩序,也支持了美国主导世界的能力与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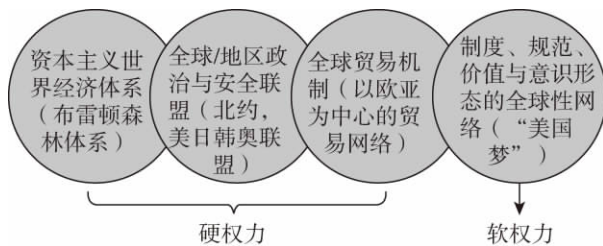


图1:美国在世界秩序主导权中的四个支柱

在笔者看来,一国内部权力的积聚、主导权的强化与其权力的外部投射,特别是塑造地区与全球秩序的力量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新葛兰西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加以解释。罗伯特·考克斯作为新葛兰西主义的代表人物,从批判学派的研究范式

^① 参见:R. W.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0(2), 1981, pp. 126-155; R. W. Cox, "Gramsci,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Essay in Method",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2(2), 1983, pp.162-175.

出发,就主导权、世界秩序与历史变迁之间的连接进行了充分阐释。在考克斯看来,上述硬权力与软权力的互动关系解释了由统治阶级及社会力量占据的对内主导权是如何延展并投射到世界范围内,进而塑造世界秩序的^①。上述对主导权的新葛兰西主义解释颇为理想,且系统全面地对权力与秩序的人为互动关系加以阐释;即特别重视意识形态、物质基础与制度规范之间的人为互动。

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考克斯指出,四个支柱所支撑的世界秩序主导权是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其附属机制所创造及再造的。其目的无非是使得美国及其统治阶级护持美国在世界秩序中的霸权地位,并塑造整个世界秩序的演进方向。在战后世界秩序的建构中,软权力仅仅是政治、经济与安全等硬权力资源的规范与价值表现。

四、“一带一路”与国际规范的供给——“相互依存式主导权”中的中国软实力

联系到当前的“一带一路”战略,在基本的规范理念倡导上,中国从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及既有的世界秩序出发,倡导“亲、诚、惠、容”和“命运共同体”等中国特色外交理念,表达一种对于理想状态国际合作的憧憬以及对于中国外交道德基准的弘扬。中国有着丰富且连贯的外交政策宣示,但对于现实中的外交行为以及世界秩序主张却缺乏系统的理论总结与国际对话。因此,“一带一路”主张与中国特色外交政策话语很难成为被世人所接受和认可的规范与价值;也因此不能直接作为国际规范供给于既有的国际社会。但上述中国特色外交理念与价值的系统表达,为中国获得了一定的道德正义形象和地区认同感,构成了中国特色“软实力”的理论及制度基础。

世界正在迈入“相互依存式主导权”的时代。“相互依存式主导权”的概念试图描绘一个新世界

秩序的进行式,即“第一世界”(守成国)与“第二世界”(崛起大国与新兴国家),在国家利益、地区发展、国际政治议程、政治联盟以及潜在冲突等交织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重塑国际安全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6]

首先,“相互依存式主导权”或称为“相互交织的主导权”,着眼于全球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多样化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社会力量与社会阶级包括更为多样的行为体与更为多元的联盟。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进入了一个融合的时代:“在转变面前,既有的世界秩序变得日趋顽固。而新的规则与制度安排却要建立在旧有秩序的基础上。由于没有历史轨迹可供国际权威加以裁决相互竞争的索求,或者决定哪些规则、规范与原则应该占据主导地位,国际秩序变得越来越稀缺”。^[7]

其次,相互依存式主导权揭示出了中国崛起与既有世界秩序的辩证连接。具体说来,中国崛起与既有世界秩序的辩证关系体现在“双重融入”的过程中。中国经济腾飞的成就得益于积极融入国际体系,而中国的融入也或多或少地挑战了世界秩序的基本规范,这可以看作一个硬币的两面。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曾表示,“一带一路”将重塑世界秩序。“很多现有的多边机构在他看来太过保守,他们在保卫自己的利益,保卫那些主宰着这些机构的国家或国际社会的利益,而这些处于统治地位的多是欧洲国家。”^[8]就“一带一路”战略中中国的“双重融入”来说,黄仁伟就指出,“一带一路”可以成为中国实践国际秩序新理念的实验场。中国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新型的国际经济、政治、安全秩序。并通过“一带一路”构建新的国际规则。在他看来,凡是涉及“一带一路”建设的规则都要逐渐建立起来。这个建立过程,就把原来老的西方规则慢慢改变了。^[9]

再次,如图2所示,世界秩序进入相互依存式

^① R. W.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0(2), 1981, pp. 126-155; R. W. Cox, “Gramsci,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Essay in Method”,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2(2), 1983, pp. 162-175.

主导权的时代意味着全球硬权力的相互依存与交融,以及软权力的多元化的趋势。中国的崛起不但打破了西方在政治、经济与技术等硬权力上的垄断地位,也从功能、范围、合法性与权威等方面,挑战了既有世界秩序中的“规范制定”权力。^[10]更进一步说,随着中国的硬权力与西方国家相互依存,中国特色的软权力也会在不远的将来呈现出相互依存的态势。但是,与西方的“规范力量”有所不同,中国不期望其他国家遵从自己提出的规则与规范,而是通过建构以集体行动与谈判为导向的“行动共同体”,展示其吸引力。^[11]这也可以看作中国通过倡议“亚投行”与“一带一路”参与全球规则变革的理论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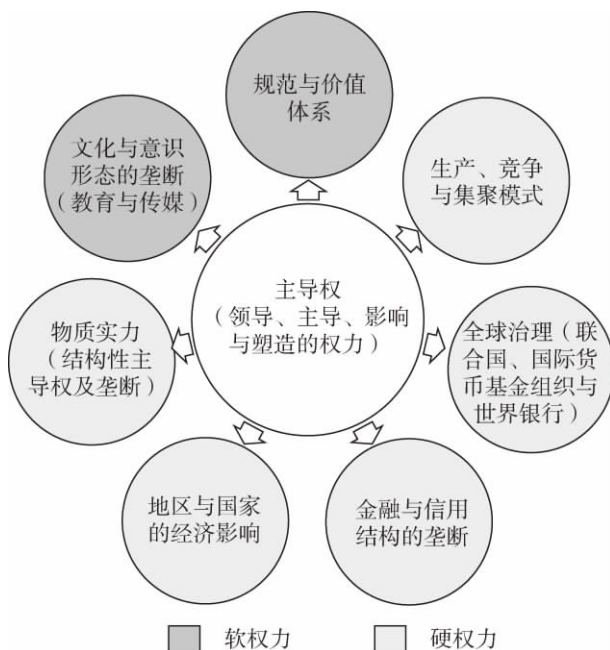


图2: 相互依存式主导权视域中的中国软、硬权力

由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为理解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崛起中的历史演进与变迁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理论视角^①。但是,沃勒斯坦笔下的世界体系本身就充满了基本的矛盾,经济繁

荣与危机的周期律动就是其中的典型。更为重要的是,跟随这类周期律动的是全球秩序主导者的兴衰。与此同时,中国的崛起作为资本主义积累模式的产物,被想当然地看作世界体系演进的一部分。按照世界体系理论的解读(图3),由于中国的经济深度融入到资本主义生产与积累方式之中,一方面中国的崛起被视为新一代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保护者,而另一方面作为新的体系维护者,中国必将在全球治理中有其独特“中国特色”。这就是为何西方媒体将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和丝路基金视为“中国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挑战”,而试图建立“中国式的国际秩序”。但是,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宏观角度来看,中国显然是为目前危机中的世界经济秩序输入了活力和新鲜血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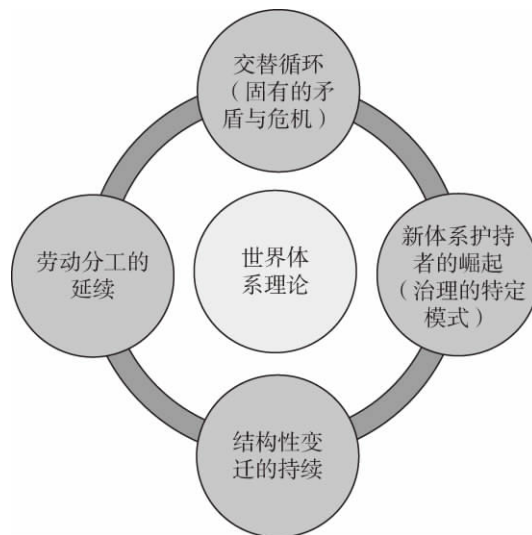


图3: 世界体系演进的历史周期律

如图3所示,随着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中国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开始主导权的对外扩张,这不可避免地对既有世界秩序在体系结构与规范建构方面带来巨大影响。从葛兰西理论来解读,中国经济主导权的对外扩张是一个辩证的整合过程,该过程整合了物质、经济层面(硬权力)以

^①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Rise and Future Demise of the of the World-Capitalist System: Concept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6, 1974, pp.387-415;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The Rise of East Asia, or The World-Syste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http://www.binghamton.edu/fbc/archive/iwriwise.htm>, 1999; *World-Systems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及社会政治、社会文化等软权力。然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仍在律动周期中的新兴国家,由于它们与体系的守成国有着不同的政治与治理文化(即不同模式的软权力),常常被视为是现行体系的挑战者。从美国等西方守城国看来,中国在试图“中国特色化”既有的世界秩序。中国人自己惯用的“中国特色”也在西方媒体中成为妖魔化中国的代名词,诸如北京在塑造“中国特色的世界秩序”等。

在世界体系理论看来,从根本上说,塑造世界秩序的核心力量是经济而不是政治或社会因素。究其缘由,世界经济是由资本积累与扩展和劳务分工的地位所主导形成“核心国—边缘国”的关系和国际规范的制定。尽管目前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主要来自于其全球经济影响,但最终其经济影响力会形成国际新规范的构成和塑造,将最终被体系通过规范谈判、议程设置与政策制度化等方式所同化。在笔者看来,尽管这种分析是建立在经济主导基础之上的,但是从世界历史进程的实例中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即规范性影响及“规范力量”是经济实力上升和对外延伸的必然结果。

五、余论:中国特色的软权力

在国际关系研究实践中,无论是对“权力”的讨论,还是对软、硬权力的脉络梳理,我们都有意或无意地进入了由美国及西方世界所主导的话语体系。究其根源,主流的政治科学与社会科学概念,都是产生于欧洲或西方历史观视域中的经济社会发展经验。这些概念其中所蕴含的是西方视野中的认知、意识(包括概念、语言、定义、期望、目标与意识等)与社会发展(经济、政治与公共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国际关系与世界秩序的历史演进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一部欧洲主导的西方历史^①。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塞缪尔·亨廷顿就注意到,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文明,日渐显现出以非西方的独特方式塑造世界秩序的愿景与权力。

近年来,崛起的中国同其他新兴国家一道,逐

渐成为了国际规范的供给侧与制定者。中国的软权力(中国特色的规范、价值、制度与特色)逐渐兴起并交互关联于既有的世界秩序之中,这一切的发生,并不是源自刻意的推广,也不同于美国式主流社会、市场(包括资本)和个人的聚合建构,而是由中国经济崛起及其日益重要的制度性角色所带来的。更进一步说,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仍旧保持成功的地位,中国经济权力的对外影响(以海外援助、国际投资与贸易为主要形式)最终将中国的政策与行为定义并打造成为富有中国特色的规范与价值。

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并不是试图创造一个替代性的世界政治与经济秩序去谋求中国价值规范与制度的国际扩张,而是通过中国的规范供给参与既有秩序的改革完善之中。中国不仅通过一系列的规范塑造行为参与国际制度设计,还正在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倡议实现对国际规范的“中国特色”建构,为国际社会提供富于东方智慧的价值与规范。一方面,日益增长的硬权力资源扩展了“中国特色”软权力的运行基础;另一方面,囿于世界对崛起中国的种种疑虑,以话语权为代表的软权力还将是中国的稀缺资源。因此,正如本文所主张的,软权力理论演进的学理脉络、软硬权力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特色的软权力与规范供给需要更深层次的理论反思。

参考文献:

- [1] Martha Finnemore, Kathryn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8, 52(04).
- [2] Joseph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M].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 [3] Steen F. Christensen, Xing Li. Emerging Powers, Emerging Markets, Emerging Societies: Global Responses [C].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① 不容否认的是,欧洲的确是当前主流价值、规范、制度和世界秩序实践的历史溯源,笔者注。

- [4]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Rise of East Asia, or The World-Syste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B/OL]. <http://www.binghamton.edu/fbc/archive/iwrise.htm>, 1997.
- [5] Roger Simon. *Gramsci's Political Thought* [M].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82.
- [6] Xing Li, Oscar G. Agustin. *Constructing and Conceptualizing 'Interdependent Hegemony' in an Era of the Rise of the BRICS and Beyond* [A]. in Li Xing (ed.). *The BRICS and Beyo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Emergence of a New World Order* [C]. Farnham, England: Ashgate, 2015.
- [7] R. L. Schweller. *The Age of Entropy: Why the New World Order Won't Be Order* [EB/OL]. *Foreign Policy*, June 16, 2014,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14-06-16/age-entropy>.
- [8] “一带一路”将重构国际秩序 [EB/OL]. *东方早报*, <http://money.163.com/15/0526/10/AQHKR7K500253B0H.html>.
- [9] 黄仁伟.“一带一路”是国际秩序新理念的试验场 [EB/OL]. *人民网*,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705/c1002-27255803.html>.
- [10] Trine Flockhart, Xing Li. *Riding the Tiger: China's Rise and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R]. DIIS Policy Paper, 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Copenhagen, 2010.
- [11] Emilian Kavalski. *Chinese Normative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s Realtional Governance of Africa and Central Asia* [A]. in Xing Li and Osman Farah (eds.). *China-Africa Relations in an Era of Great Transformation* [C]. Surrey, UK: Ashgate Publisher, 2013.

Theoretical Basis of Chinese Soft Power Characteristics

——“One Belt, One Road” and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national Normal Supply

Li Xing¹, Zhang Jiuan²

(1. Research Center o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alborg University, 9220 Aalborg, Denmark;

2. School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Key words] soft power; hegemony; “One Belt, One Road”; international norm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 in connection with its rise as an international norm-provider, this article offer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conceptualizing “soft power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is article, the Gramscian political theory and neo-Gramscian IR theory are applied to critically review Nye's soft power notion. It intends to treat soft power both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internal pattern of hegemony and as part of outward power expansion in shaping the world order. In additi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uthor's own “interdependent hegemony” theory aims to posit that hegemony, both hard and soft power, will be intertwined in an era of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i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remained to be successful in a long run, the external expansion of its economic power—especially its overseas aid, investment and trade—would eventually make Chinese policies and practices become “normal”. As a result, the conventional notion of soft power would have to accommodate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责任编辑 刘蔚然]